

美国进步记者路易斯·斯特朗涉藏译介策略研究

方霞

四川民族学院, 四川 甘孜 626001

DOI:10.61369/SE.2026060019

摘 要：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是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其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是重新塑造中国立场、讲述中国故事的经典之作。本文选取《百万农奴站起来》为例，分析涉藏译介过程中的话语建构方式及国际传播策略，探究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提升中国叙事的主体性并加强对外传播的有效性，从而为中国对外叙事与传播提供借鉴。

关 键 词： 路易斯·斯特朗；涉藏译介；跨文化传播

Cross-Cultural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ng Tibetan Stories by Anna Louise Strong

Fang Xia

Sichuan Minzu College, Ganzi, Sichuan 626001

Abstract： Anna Louise Strong was an American progressive journalist and writer whose news reports and literary works are regarded as classic texts for presenting China's perspective and facilitat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its narratives. Using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iscursive strategies Strong employs to communicate China's narrative and enhance i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aims to show how these strategies reinforce China's narrative voice and facilitate more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engagement.

Keywords： Anna Louise Strong; Tibetan storytell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以构建中国形象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是当今时代议题。其中，涉藏叙事关乎国家主权、安全和形象，更是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面对长期偏见和信息失衡，中国如何优化对外叙事和传播方式是打破偏见、引导认知、赢得共鸣以传播西藏真实形象的关键。

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叛乱分子发动叛乱，中国政府平叛动乱并拉开西藏民主改革序幕。而部分西方媒体罔顾历史事实，肆意捏造中国“入侵西藏”、“侵犯人权”、“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等失实叙事，造成国际舆论场事实与认知的长期错位，固化国际民众的长期偏见。在此背景下，同年8月路易斯·斯特朗踏上神圣的西藏采访之旅，通过亲自采访的一手材料，出版了《百万农奴站起来》（*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这一经典著作，正面回答了西方媒体“关心”的西藏话题，成为西藏对外传播的经典之作。通过分析该作品的译介策略，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跨文化传播机制的理解，也为中国及西藏地方政府讲好西藏故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一、译介之“术”：跨文化传播中的策略选择

在《百万农奴站起来》中，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跨文化译介意识。她通过多种译介策略的灵活运用，引导性地回应了西方关于西藏的偏见与误读；在打破既有涉藏议题叙事框架和传播套路的同时，又积极重塑了中国的涉藏话语语境，在国际舆论场中主动建构中国形象、有效传播中国声音。

（一）引号策略：语义限定与概念澄清

中西方历史背景和价值体系不同，同一术语往往承载不同的含义，尤其是涉藏叙事中“自治”“主权”“改革”“统一”“民主”和“解放”等关键术语，若不加以语义限定和概念解释，西方读者

往往按照自己熟悉的语境加以理解，从而造成认知偏差或刻意曲解。面对容易引发歧义或争议的核心概念，斯特朗采用双引号对关键词加以限定，保留解释的空间，便于后续解释、澄清及重构话语。

例如，在谈到西藏自治时，斯特朗指出部分国家对西藏“自治”一词的曲解：

ST（原文）：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autonomy” has many shades of meaning. Britain, followed in this by India, sought to define “autonomy” as a type of “independence” which might permit privileges to foreign powers.^{[1]47}

TT（译文）：这一阐明非常重要，因为“自治”含义很广。开始是英国，接着是印度。都试图把“自治”解释为“独立”，

这种“独立”可以使外国享有特权。^{[2]32}

为澄清概念，斯特朗在谈及“自治”一词时始终采用引号策略，提醒读者该词含义有别于西方理解，避免读者自动套用已有认知。接着，她引证《十七条协议》指出西藏自治的真正含义：

ST: An “autonomous legion” has its own language, customs, religion, and elects its local government for local affairs, and its deputies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to handle national affairs.^{[1]47}

TT: 所谓“自治区”指拥有自己的语言、风俗、宗教以及选举地方政府，处理地方事务，地方政府选出代表出席全国人大，参与处理国事……这样的自治绝非‘独立’，也没有允许外国干涉的条件。^{[2]32}

通过引号策略，斯特朗在限定语义的同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澄清，使其在叙述中与西方理解保持适度距离。她主动界定“独立”一词在中国语境下的含义，并将其置于中国法律与政策的评判框架之中，从而建构出具有中国立场的话语体系，引导目标语受众理解并接受这一语境化的“独立”概念。

（二）他者叙述：多元视角与以小见大

涉藏叙事中，单一立场的阐述往往被视为缺乏客观性和说服力，加深受众刻板印象和怀疑态度；此外，单向的“对外宣传”模式往往缺乏具体事实和生活细节，难以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导致传播效果受限。相比之下，斯特朗往往采用他者叙述，通过呈现边缘群体或个体的经历，以多元视角折射宏观社会与文化现实，实现“以小见大”的叙事效果，增强叙事的真实性和亲和力。

为真实呈现西藏改革取得的进步与发展，斯特朗向读者完整呈现了人物采访的真实经历，塑造了一群鲜活的新闻人物。德吉是翻身农奴的代表，过去悲惨的农奴生活与如今重获新生的喜悦，形成了西藏改革下农奴翻身的历史写照，“过去我们头上有太阳，但那属于领主，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太阳”^{[2]108}。（“In the past there was a sun shining over our heads but it belonged to the lord. Now we have a sun of our own.”^{[1]158}）在旧西藏寺庙体系中，僧人被划分为享有特权的上层高僧与饱受欺凌的下层僧人。曲乃仁增作为下层僧人曾长期遭受劳役与苦役，寺院改革后成为了“平叛委员会”主席，其个人际遇的转变正是宗教制度发生深刻变革的缩影，“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吃得饱，这是前所未有的”^{[2]138}。（“Now we are masters of our own lives and not only are we free but we have enough to eat which we never had before.”^{[1]224}）此外，作为旧西藏社会中最直接的既得利益者，高层人物和贵族也成为斯特朗透视西藏社会发展变革的高端窗口，帮助斯特朗从宏观上把握西藏变革的本质和走向。^[4]

整体而言，斯特朗通过引入多元立场的见证和评价，结合具体人物故事与情感叙事，将宏大的社会改革具体化和可感知化，不仅增强了报道的真实性和说服力，也营造出既客观又具有亲和力的话语场，使目标受众能够在情感与认知上与宏大的社会变革建立联系。

（三）意象描写：叙事构建与价值铺垫

长期以来，西方读者对西藏的了解往往停留在抽象的新闻报道或猎奇式的文化想象层面，缺乏具体可感的认知媒介。如何让远在万里之外的受众真正“看到”西藏的社会变迁，是斯特朗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的现实难题。为此，她在译介中大量引入繁复多样、具体可感的客观物象——景物、建筑、人物、物品等。这些意象描写并非简单的修辞点缀，而是服务于特定叙事意图的策略性书写。与直白说理不同，意象描写将抽象的价值判断转化为读者可以感知的画面，从而在跨文化传播中增进理解与认同。

首先，具体可感的文化意象，拉近了读者与陌生语境的距离：如西藏专线机舱内部的高雅陈设，在“赴极乐世界之舫”凉亭举办的藏式野餐，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戏剧演绎，达赖“真身”的陵寝形态及丧葬礼制等。此类文化意象描写不仅满足了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更作为一扇可视化窗口，帮助西方读者“看到”并“体验”藏族文化，在欣赏自然与人文意境的同时，走近对西藏社会现实的理解。

其次，地点意象为斯特朗的新闻走访提供了空间坐标。斯特朗采用涉藏采访记者的第一视角，以新闻走访叙事的方式真实还原了西藏社会的过去与现在。这一过程中，地点描写正为作者的采访与见闻提供了空间坐标，如第五章至第九章各以寺庙、宫殿或村庄等地点的外部形态与内部陈设描写为开篇，继而引出后文对农奴制和旧宗教制度的讨论。此类时空切换为文本叙事提供了链条式衔接，形成有机的整体叙事结构，帮助读者顺畅地跟随作者的叙述节奏进入对西藏社会现实的讨论。

最后，空间意象还发挥了价值铺垫的重要作用。如第六章以珍娜的工作地点大昭寺为切入点，在描绘寺庙的露天庭院时，阴沉昏暗、院墙高大、井底深邃、群鸽盘旋等意象描写营造出沉郁压抑的空间氛围，这不仅服务于场景再现，更是对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寺庙空间特征的文学化再现，是旧制度宗教特权与压迫氛围的视觉缩影，为后文进一步讨论寺庙剥削和大昭寺叛乱奠定了情感基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大昭寺外的景象：阳光洒落，石径蜿蜒；店铺楼宇，鳞次栉比；环寺而立，市井繁荣。外部意象与内部庭院构成了鲜明的空间对照，曾经的宗教中心不再以森严的高墙隔绝尘世，而是自然地融入明亮开阔的市井生活之中，勾勒旧宗教制度改革后民众生活改善、经济活力提升的真实图景。走出寺庙，放眼乡村。第七章对拉萨东部村庄的描绘，继续将目光投向废除农奴制后普通民众生活空间的根本改善：城市街道、沿路市场、楼房店铺、运输卡车等场景描绘，重现了拉萨东部村庄的多层次景观。这些细节描写与湍急河流、湛蓝天空、雪白云朵和青色山峦等自然景观遥相呼应，构建出美好生活的发展图景，与过去农奴制下的生活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从寺庙内部的阴沉封闭，到寺庙外部的市井繁荣，再到村庄的明朗活力，意象描写以空间对照呈现出社会面貌的显著变化，既保留了叙事的现场感与客观性，也使读者在具体情境中体会到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实际影响。

综上，意象描写强化了新闻走访文本的在场感与客观性，使作者立场隐于画面之后，读者在“观看”中自行生成判断；另一

方面，这些精心选择的意象——无论是寺庙的幽暗还是市集的繁荣——都在读者心中预先铺设了价值铺垫，为后续的议题讨论提供情感与逻辑的双重支撑。由此，意象描写完成了从视觉经验到认知认同的过渡，成为话语建构中一种隐蔽而有效的叙事策略。

（四）对比叙事：偏见回应与话语重构

西方涉藏话语不仅系统否定中国立场，更形成了一套以“入侵”“压迫”“专制”等核心标签为框架的封闭叙事逻辑。这套逻辑通过选择性呈现事实、抽离历史语境，污名化中国政府的正当行为。面对这种叙事陷阱，斯特朗在叙述中有意引入与西方主流叙事相异甚至相悖的事实、视角或价值判断，通过对照生成语义张力，从而引导受众突破既有话语的认知闭环。在其涉藏叙事中，这一对比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对既有舆论偏见的正面回应，其二是对既定叙事框架的整体重构。

1959年，国际社会围绕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构建了密集的舆论攻势，将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一年接管西藏视作“侵略”行为。斯特朗以昌都战役的历史细节为据，回应上述“指控”：昌都地区部分藏军并未与解放军发生实质性交火，双方一见如故；且“解放军并没有追击，而是就地安营扎寨长达八个月之久，以等待相关问题的协商解决”^{[2][30]}。（“The PLA did not pursue its victory into Tibet proper but encamped near Chamdo for eight months to await the conference which would come.”^{[1][44]}）这段叙事中，“未交火”“一见如故”“安营扎寨”“八个月等待”等一系列细节描写相互呼应，将事件重置于和平协商的语境之下，与“入侵—征服”的既有叙事形成对照，使相关舆论不攻自破。

偏见回应后，斯特朗又通过对比叙事揭示西藏社会改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进一步瓦解不实指控，重构西藏社会改革的历史叙事框架。一方面，她详细论述中央政府严格履行协议承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维持地方政府职权、保护喇嘛寺庙、保障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又以旧西藏地方政府不履行协议形成鲜明对比，指出其在地方层面阻挠改革、制造谣言、克扣新农粮等行为。这一历史对比叙事深刻揭示了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黑暗与落后，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解放百万农奴的伟大历史必然性。它向世界表明，西藏的社会进步与发展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扫除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旧制度后取得的。

整体而言，从偏见回应到话语重构，整个过程形成了连续的对比叙事链条，不仅回应了西方偏见，还凸显了中央政策的合理性和积极影响，从而在国际舆论和历史叙事中实现话语主动权和价值再定义。

二、译介之“因”：从个人立场到时代语境的综合影响

综上，斯特朗的译介策略沿着一条由微观到宏观、由语义到叙事的递进路径层层展开。引号策略在词句层面消除概念歧义、补足语境信息，为后续叙事扫清理解障碍。在此基础上，他者叙

述借助亲历者的外部声音，在事实层面提供客观支撑，形成“我说”与“他说”的共振。意象描写则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可感的视觉画面，在感性层面增进读者认同。最后，对比叙事以整体性的对照逻辑回应并瓦解西方偏见框架，完成对西藏社会改革叙事的结构性重构。四者环环相扣，由语义澄清到信息补充，由主动立言到借力发声，由感性转化到框架重塑，共同构成斯特朗涉藏叙事的话语操作系统。

路易斯·斯特朗在译介叙事中采用的具体策略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深深根植于她的思想背景与人生经历之中。正是这些思想与经历，深刻塑造了她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使其采访兼具道义底色、在场叙事、跨文化能动与传播效力，实现了价值关怀、纪实深度与国际传播力的统一。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幼年时就从其父亲——一位公理会牧师那里学习政治和社会改革，并付诸实践。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斯特朗明白，金钱、名誉、人们的看法，都比不上纯真的心灵^[9]。这种信念造就了她坚贞不渝的道德底色，在新闻实践中一直坚持追求真理、独立思考，不为外界压力或者舆论所左右。因此，其涉藏采访始终彰显出鲜明的价值追求，尊重事实、力求真实，使其报道不单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带有道义责任感文化交流。另外，她早年生活在社会福音运动的家庭，并接受了哲学博士教育，长期关注社会改革与底层群体处境，为她后来在中国采访时关注农民、下层僧人、妇女等普通百姓打下坚实的价值取向基础，使其报道带有浓厚的人本色彩和现实关怀。

除此之外，作为受过系统新闻训练的记者，斯特朗写作时一直坚持以事实为基础，依靠实地考察和一手采访建构文本内容。在西藏采访中，她多次到寺庙、宫殿、村庄、偏远乡镇，同僧侣、地方干部、农牧民、普通村民等进行交谈，详细记录他们的生活细节、信仰实践、日常情感。斯特朗在写作时重视细节描写、场景再现，用多角度的引述、人物对话来再现事件的真实性。扎根现实、重视证据的报道方式使作品颇具纪实性、现场感，增强了叙事的说服力，给国际读者呈现了一个生动、立体、具体的中国图景，有效地提高了“中国故事”的传播力和可信度。

同时，斯特朗在苏联长期的工作、生活经历，使她认识到国际传播不是单向的信息输出，而是与政治语境和意识形态互动的复杂过程。因此，她在报道中国时，始终以事实为基础，依靠实地考察和一手资料重塑事件的真相，主动纠正外界的误解和偏见。她既不被西方舆论所支配，也不被其所奴役，而是在理性的论证与道义的关怀之下，重新塑造中国的叙事方式和意义空间。以鲜活的个体故事、真实的生活细节为依托，把中国的社会变革、人民处境、价值追求融入到可感可知的叙述当中，完成了由“被报道对象”到“主动讲述者”的转变。以事实为基础、以道义为立场的传播实践，在跨文化传播中很好地回答了质疑，主动塑造出可信、立体的中国形象，体现了新闻主体的能动性。

最后，依靠对西方受众心理的深刻认识，斯特朗利用西方社会所熟知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话语，比如“民主”“自由”“进步”等，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实践进行文化解释和意义转化。同

时，在叙述中用意象描写的手段、细节刻画的技术来增强文本的可读性、生动性。另外，考虑到专业术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造成的误解、曲解问题，她有意改变表达方式和话语策略以减少误解。通过这种跨文化“再编码”与精心话语设计相结合的策略，她的报道不仅在价值观层面与西方读者产生共鸣，也提升了文本的理解度、可信度和传播力。

总体而言，斯特朗的个人经历不仅使其采访和报道更具真实性和说服力，还为其报道注入了鲜明的思想深度与跨文化解释能力，成为推动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重要媒介。

三、译介之“思”：中国叙事的重构与启示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成长经历和新闻实践，给当下中国国际传播赋予了诸多启迪。她从小便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坚持真理、保持心灵纯洁的价值信条，使其报道一直保持道义感和公信力，这告诫我们涉藏叙事要以真实可信为基础，以事实、数据和案例为支撑，塑造出有温度的中国叙事。她坚信人民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为我们提供了话语重塑的重要视角，

即应该呈现普通民众的真实声音，展示群众主动参与发展的过程，从而消除西方“被代表”的叙事偏见。她深入西藏农村、寺庙，同普通群众直接交谈，形成了亲历性的报道，这启示我们应该走近基层，用具体的个人故事、生动的情境来展现民生改善、社会团结的西藏现实，使受众能够“看得见”、“感受到”。另外，斯特朗用事实和道义来回应质疑、打破偏见，说明国际传播不能只停留在被动的辩解上，而应该主动澄清谣言、反击歪曲叙事，积极塑造有主体性、有文化自信的中国形象，使国际社会在多元的叙事中形成更公正的认识。最后，斯特朗善于把握西方读者的理解习惯，用西方社会熟悉的概念阐释西藏社会变革与发展，用生动的描写、人物的叙述提高文本的可读性，并时刻调整措辞和话语表达，防止读者产生误解或曲解。这表明对外传播不能只重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还要凸显叙事的艺术性、语义的准确性，提高文本的传播力和解释力。从总体上看，斯特朗的经验显示，只有在价值坚持、内容真实、叙述生动、语义准确、主动塑造等方面共同努力，中国的国际传播才能更具说服力，才能长期有效地引导全球舆论。

参考文献

-
- [1] STRONG A L.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M]. San Francisco: Red Sun Publishers, 1976.
- [2]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百万农奴站起来 [M]. 孟黎莎, 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9.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 [EB/OL]. (2021-05-21)[2026-04-18]. <http://www.scio.gov.cn/gxzt/dtzt/2021/xzhpjfyfrfzbps/>.
- [4] 周德仓.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59 年西藏采访报道的对外传播意义解读 [J]. 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27(01): 79-85.
- [5] 斯特朗, 凯萨. 纯净的心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 [M]. 李和协,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2.